

訪問：蒙兆達 吳冠君 答：黃洪

問：退休保障問題已討論多年，政府經常推說社會未有共識，就您所見，民間倡議的方案是否已達致共識？

答：綜觀不同民間團體所倡議的方案，其實有三個共同點，首先，最重要的是「全民性」。「全民」的意思是不需要特別入息及資產審查，亦不需要供過款才受保障。

第二，保障的水平相近。最初提出時是六、七年前的事，當時講3000元，但如果計算這些年來的通脹及生活開支增加，目前水平大概是4000元。如果依照目前的長者綜援金額，連同租金津貼作計算，亦是接近4000元的水平。

第三，我們建議的是一個供款性制度，勞方及資方都參與，再加上政府的稅收。如果錢全部由政府出的話，其實可行性不高，在不可能大幅加稅的情況下，政府會將水平壓得很低，或者將資產及入息限額訂得很緊。所以，三方供款反而是一個理性、長遠及可持續的方案。

問：會否擔心政府推說已經搞了長者生活津貼，只願意在長生津方面修修補補，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？

答：我們跟政府的概念很不同，現時所謂長者生活津貼只是2200元，而且也不是全民，需要經過一個入息及資產審查。這是跟政府最大不同點。如果政府回應不如改善長生津，開一個價，大家又不用供款，表面上好似幾吸引。大部份僱員有MPF的資產，就不夠資格申請長者津貼，等用完MPF的錢再想。這其實十分短視。二三十年之後，這套想法就完全行不通，我們不可能不考慮政府的財政承擔能力。如果政府這樣拖下去，其實我真係覺得幾「熨」，老人家已經唔可以再等。

問：有一種講法認為，外國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不少都出現「爆煲」情況，因此擔心香港會重蹈覆轍？

答：其實我們已多次澄清，我們倡議的方案跟外國

那些「隨收隨支」(pay as you go)的制度很不同。這些制度是「餐搵餐食餐餐清」，每年不論用收入釐訂支出，或是以支出釐訂收入，基本上不會再儲錢在計劃之中。但對我們倡議的退休方案來說，我們已經對未來人口結構有一個預算，例如考慮出生率、每年新來港人士、勞動人口變化等不同因素。所以我們是做一個「部份預籌款項」(partially prefunded scheme)的計劃，即是為未來十年二十年「尚未退休的整整一代人儲錢，到時儲錢加埋利息就會夠用，所以不是一個「餐搵餐食餐餐清」的計劃。

問：那麼現時外國的退休制度是否比從前更強調個人承擔？

答：其實世界銀行也做了很多研究，結果發現「個人專戶」(如強積金或公積金戶口)的做法出現了很大問題。在過去十多年，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，投資跌得很厲害，如果剛剛不幸在經濟低迷時退休，當中的風險不是個人可以承擔得到。所以，世界銀行也承認要回到傳統去，強調大家是一個整體，風險分開承擔，不是由個人單獨去面對，而是由整個社會一起去面對。

問：政府已就退休保障問題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研究，並會就此提交報告，您對此有何期望？

答：如果大家期望周教授的報告會講「錢從何來」，可能會有少少失望；我預計報告只會講不同方案需要用多少錢，至於那一種方案最可行、財政上較能持續，周教授可能只會建議給政府及扶貧委員會，由他們自行討論及決定。「錢從何來」是敏感的問題。民間方案傾向認為政府應該佔六成，勞資雙方各佔兩成，所謂「六二二」。因為大家都覺得政府拖了很久，責任最大，而現時政府財政盈餘豐厚，是用種子基金還是每年供款形式去處理，則可以另作討論。

對於資方來說，民間方案傾向認為，應該盈利較多的大企業相應要貢獻要多一些。因為大企業的豐厚利潤也是由這些年長工人努力幫他們賺回來的，所以在責任上亦應該承擔更多負擔高些供款率。

我始終認為，關鍵在於政府有沒有視野及政治勇氣，在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中間，帶領大家去梳理一個對香港長遠有利的方案。



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